

●新书赏析

街头,传统与现代的角逐之地

——读王笛教授的《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

禾刀

市民“占据”街头,首先当然因为街头是生存之源。为了生存,人们总会不失时机地绽放出生命的坚韧力量。1917年,成都先后遭遇川滇、川黔军阀混战,民众苦不堪言。然而,每次巷战尚未完全停歇,“小贩们就冒着生命危险出来兜售货物和食品”。“一位1906年来蓉(编者按:成都市的简称)的美国传教士估计,成都街头约有150种不同的小贩,主要销售食物、日用和妆饰三大类商品。”相较于商店,小贩无疑更接近顾客,他们为市民日常生活提供的商品未必最好,但一定是最为方便。小贩胆敢冒险营生,一方面因家贫底薄,生存压力巨大,所以才会险中求生;另一方面也因他们对市场的嗅觉更为灵敏,反应更为灵活,所以只要觅得一丝商机,他们总会以最快速度走上街头。

虽说为了生存,但传统的成都街头呈现的并不是丛林法则。在公共管理长期缺位情况下,各行各业渐渐形成了不成文的“行规”:处于规则顶端的管理者既有“袍哥”那样以“摆平”为业、长期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传奇人物,也有由市民举荐的街首、族长和乡贤等底层要人。

成都街头的原始自治模式肯定有其积极的一面,比如一些“行规”就促进了“职业道德”的提升,比如那些有职业操守的挑水夫多不穿鞋,“因为赤着脚,他们便能走到河中间去取最清亮的水”。当然,这种不受约束的自治模式难免也暴露出一些负面问题,比如过于强调地域保护,导致地域歧视现象日益恶化,如车夫“对那些新来的外地人和乡下人”漫天要价。这一点,在萧红的《马伯乐》一书里亦有深刻的描述。进一步看,这些“行规”并不利于构建公平竞争的市场机制,也可能进一步强化对落后传统的保护。事实上,当汽车越来越多地出现在成都街头时,就曾遭到传统人力运输从业者的强烈反弹。

警察的出现,是公共力量强化街头存在的重要标志。在此之前,“地方官员很少控制集市、市场、小贩和店铺”。随着警察加强公共治理,街头进步明显,比如脏乱的街道终于得以清扫,公厕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街头,混乱的交通秩序得到明显改观等。警察推行的许多举措肯定赢得了市民的好感,但与此同时,警察对街头规制力量的深入介入,必然意味传统散漫的街头自治模式走向崩解,甚至与底层民众的街

头生存发生激烈冲突。

回溯近代中国,街头女性在推动社会革新方面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王笛教授认为,“妇女享受城市公共空间的权力,走过了漫长的道路,除了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外,与她们不断为自己争取权利也有关”。

争取权利,必须与延续数千年的“女德”传统决裂。决裂表现主要有两点,一是女性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街头,尤其是过去根本不可能出现的地方,如戏院、茶馆等。另一个重要表现便是衣着的变化。有趣的是,开女性衣着风气之先河的,很可能是那些原本受到精英鄙视的“社会失足妇女”。

走向现代,意味着与传统告别。同许多百年前的中国城市一样,在走向现代的过程中,成都选择拆毁那些象征“闭关自守时代”产物的城墙。城墙并不会存在先天的善恶,国人革新之所以特别在意对旧物的摒弃,因为在长期历史发展进程中,一些传统的东西常常被赋予浓厚的封建色彩,而像宫廷、衙门、城墙、轿子、辫子等则成为大众对抗封建统治的移情对象。对于那些渴望跳出传统压制力量的民众而言,不破除这些象征旧传统的“老古董”,似乎就不足以从思想上与传统划清界限,就不足以彻底砸开精神上的枷锁。从这层意义上讲,王笛教授书写百年前的成都,也是在透过这扇窗口管窥百年前的中国。

众所周知,现代本就是传统的对应物,社会发展总是伴随着这样一对力量的艰难博弈。许多时候,推动现代变革的力量越大,意味其遭遇到的传统守旧捍卫力量愈强。还可以肯定的是,传统中并非全是糟粕,现代中也并非全是精华。当现代与传统缺乏协商机制,只剩下双方力量的层层加码,原本和颜悦色的博弈于是失去了彼此妥协的可能,至而滑向极端对抗的深渊。当这样激烈色彩的角逐力量表现在街头这一公共舞台时,实际意味着彼此共生的双方正在加剧“撕裂”。

今天,我们跟着王笛教授一起追寻百年前成都的古街道,显然不只是为了唤醒对历史的斑驳记忆,成为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应试着从中寻觅一条现代与传统友好协商、和谐共处的科学渠道,毕竟我们既需要革新,也需要历史积淀。革新催人进步,历史积淀则是我们文化的血脉之源。



●暇观亭书话

说藏书(下)

易重廉

有一本书,《中国现代作家与日本》,靳明全先生撰,山东文艺出版社1993年8月出版。我看了,知道中国当代的那一长串闪闪发光的文化巨人:鲁迅、郭沫若等等,都是从日本学成归来而名扬天下的。作者在《后记》里概而言之:“中日文化交流,近代以前,呈中国传授日本接收的态势,近代以降到现代,则有了一定程度的逆向性变化。”

的确,对日本《浦岛传说》有过直接影响的唐人传奇《游仙窟》,中国人早已忘得干干净净,直至清末,才把它找了回来。更无怪魏源著作已在日本深入人心,而中国那时还不知道魏源是个什么“人物”!想起靳先生发现的这一条中国对日本的“一定程度的逆向性变化”,我们只有愧疚!当然,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在文化方面犯下的严重罪行,中国人民可决不会轻易忘记的。

平心而论,最懂得中国文化的,毕竟是中国人!甲骨文出土已许多年了,甲骨文字也认出那么多了,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甲骨文难字是外国人认出来的。一部古典,几经刻印,几经传抄,那些号称原版的善本,也难免出现这样那样的错误。外国人即使已是研究汉学的资深专家,限于客观条件,也往往会出现以讹传讹、习非为是的情况。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战国策》上有一篇《触龙说赵太后》的著名文章,长时来,“触龙”作“触馨”。“馨”字少见,旧《辞源》不收。《说文》释为“失气言”,或“言不止”,即啰嗦的意思。近年在长沙马王堆汉墓里发现了一个“抄本”,“馨”作“龙”,“龙”下的“言”是从“说”字中误抄入的。此说可取,故今人正之。外国人见不到新出土的“抄本”,当然就只好一直误下去了。

《聊斋志异》里也有一篇著名文章《促织》,也常用作教材。文中有一句“上于盆而养之”的话,许多人讲不贴切。后来,有人发现了蒲松龄的“手稿”,原来,活字排版的时候,“土”误排成“上”了。“土”作动词用,义为“放点土”。促织养在盆里,里面放点土,促织才舒服,如此而已。

“抄本”与“刻本”可以互校,择善而从。“稿本”是孤本,更有校正“刻本”的用处。外国人很难见到“抄本”,更难见到“稿本”。藏在外国图书馆里的那些“刻本”,如有错误,自然也就不知什么时候才可以改正过来了。读书只读藏在外国图书馆里的中国“刻本”,有时候,是不怎么靠得住的呀!

最后,我想说说中国地方图书馆的藏书情况。

一,由于历史的原因,省以下图书馆的购书经费严重不足,这不是一天两天解决得好的。有一条办法建议考虑,学习江苏无锡图书馆。无锡市读书人多,专家学者多。图书馆有见及此,抓紧组建了“无锡籍专家、学者著作专库”,拼命搜集专家学者的著作入“库”。报载:1990年9月,他们在2000多位专家学者中征得专著937种。2005年,“无锡人著作展”上,捐收著作激增增至2600种,前景看好。这样做,一方面会提高专家学者对家乡的热爱与关怀之情,另一方面,也会使无锡市图书馆的品位很快地获得长足的提高,是互利双赢的大好事。

二,也由于历史的原因,图书馆的工作人员数量不够,质量更谈不上。新书旧了、破了,不知道修补,更不愿意修补。其实,有些旧书,破书价值很高,如余秋雨先生的散文集《文化苦旅》,在海峡两岸一版再版,其中仅印了一万册的大陆初版即十分珍贵。要好好珍藏,不能随便出借。一些高品质的学术著作,印数本来极少,又难有重版的机会,外借也要慎重。《邵阳日报》编辑刘振华说他在地摊上买了一本杨树达先生的《〈马氏文通〉刊误》。《马氏文通》是国内汉语语法书的开山之作,是名著。加上汉语大家杨树达先生的“刊误”,应该就成了名著中的名著。为什么会从一个大学的图书馆里“剔旧”出来了?这使我联想起当年许广平先生对鲁迅手稿被人用作油炸包裹纸而大发雷霆的那件事来。

不懂书,不爱书,不敬书,图书馆的“藏书”怎么会一天一天地多起来、好起来呢?



如同所有的城市,成都无时不在面临传统与现代力量的角逐,尽管许多时候看上去角逐各方的力量似乎微不足道;如同所有的角逐,成都街头无时不在上演一幕幕历史剧,尽管演出者大都是那些寂寂无名之辈。

继《茶馆》《袍哥》后,历史学家、被誉为最懂成都的成都人、澳门大学教授王笛,再一次将目光聚焦于成都的街头巷尾。《消失的古城:清末民初成都的日常生活记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年1月出版)一书中,王笛教授精心描绘了成都街头的听戏、泡茶馆、逛庙会、节日庆典、街头政治、改良与革命等活动,以及乞丐、苦力、小贩、工匠、挑水夫、算命先生、剃头匠等各种身份的人,并从学术语境、微观史角度,以通俗生动的语言,形象生动地还原了这座历史文化名城的前世今生。

百多年前的成都,街道狭窄,左邻右舍彼此相闻,“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人际关系”,这一点在现今的许多农村亦不乏例证。成都的“居民把街头作为他们日常生活的空间,他们的房子接近街头,因此他们的日常生活经常就发生在街头”,亦可说,“普通市民是街头的主要占据者”。

●读者感悟

让更多家庭弥漫“书香”

陈永江

我们家庭“读友会”,有8个成员。刚刚退休那阵子,孩子们担心我会寂寞,每次回来,都爱拉我打牌。我跟他们说,不要以为打牌才是休闲,其实读书好比精神体操,可以锻炼思维和认知,可以保持内心的和谐,是最好的休闲。居里夫人说:“只要你认真读书,你会挖掘出书中的‘宝藏’,这时你会发现读书是一种享受。”

孩子们高高兴兴地把麻将桌撤了。我们成立了“家庭读友会”,孩子们选我当“会长”。孩子们说:“我们可以用来读书的时间不多,您读书多,可以经常给我们推荐阅读书目吧?”

如今,四年过去了,我和孩子成为“读友”。我们相约多读书,还要多读好书,读书之后大家一起探讨书中人物的性格和品格。比如,当习近平同志倡导向焦裕禄学习,我就向担任领导职务的儿子、女儿推荐阅读《焦裕禄的故事》《焦裕禄传》《焦裕禄一生》等书籍。常常,我是这个星期推荐,下个星期“检查”,检查的方式,就是大家在一起交流阅读体会。这样做的好处,一是督促读书数量,免得他们读书拖拖拉拉;二是提高读书质量,避免读书囫圇吞枣。

对孙辈的读书,我则更多地去看意培养他们的阅读兴趣。首先是营造读书气



氛,沙发上、茶几上、床头边,处处都摆放着图书,有《小男生杜歌飞》《影响小学生一生的名人成才故事》《中华上下五千年》《脑筋急转弯》《差等生牛顿》……既有科普的,也有童话的,随便拿来都可读、耐读。其次是陪伴阅读。寒暑假里,我们家庭是书香飘散的美好时光。为了让孙子、外孙女能更准确地了解书中的内容,我陪着他们俩一块阅读。有时让孩子读,我听;有时我读,让孩子听。亲子阅读,既能沟通感情,又激发孩子的学习兴趣。再次,是鼓励阅读。我会经常组织开个“家庭故事会”,让孩子讲书里的故事,大人当听众做评委。孩子们谁故事讲得好,我还奖励谁学习用品。渐渐养成读书习惯以后,孩子们每次回来,都会问我:“今天又给我们准备了什么好书?”

学习是人类永恒的课题。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快速、优质学习的信息时代。

有人说:当今世界,不一定是有权人的世界,也不一定是有钱人的世界,而一定是有心人的世界。学习力是唯一持久的竞争力。历史证明,一个善于学习的民族,必定是一个充满希望的民族;一个爱学习的家庭,必将是一个充满和谐的家庭。

学习能使家庭成员素质得到提高;学习能使家庭成员的人格得到升华;学习能使家庭成员心胸开阔,相互包容;学习能使家庭成员境界提升,相互支持;学习能使家庭成员获得物质和精神财富;学习能使家庭成员提升生活质量。

社会似海洋,家庭如港湾。学习型家庭建设,是以提高社会适应能力和提高生活质量为目的的家庭成员共同学习、相互学习、一起成长的家庭模式,也为两代人的沟通交流提供互动平台。不妨,你家里也试试?

(据《中华读书报》)